



“野生野长”的中国新生代科幻

□ 王晋康

我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（10岁娇儿逼着讲故事），而在20世纪90年代懵懵然上了科幻这条“贼”船，从此再没下来。我当时并不知道，中国科幻那时正处于最艰难的境地。此前，在20世纪80年代末，它受到一场不公平的，所谓“科幻就是伪科学”的全国性批判，国内所有的科幻发表阵地全部失守，只余下四川的《科幻世界》勉力维持，但销量锐减。作家流失，杂志质量下降，在生死线上艰难挣扎。

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仍坚持每年举办银河奖，召开作者笔会，甚至承办国际科幻年会。为了争得举办权，时任社长杨潇坐了一星期的火车（没钱买机票）赶往荷兰，腿都坐肿了，被参会的国外作家们看成“很科幻的事”，最后硬是以这样的精神争得在中国举办世界科幻年会的权利。在这样的坚持下他们艰难保住了国内唯一的科幻发表阵地，也造就了该杂志在中国科幻界中的王霸地位。中国科幻银河奖虽然已经声名显赫，其实该杂志的奖项，按“出身”论档次“很低”的，但它在中国科幻界的地位却无法被撼动。我常说，没有他们的坚持，中国科幻的复苏至少要推迟十年时间。

自从那场批判之后，很长时间，科幻文学在国内是被看作异类的。写科幻是一项非常寂寞清冷的事业，无名无利，稿费低，不被社会关注，被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忽视。当然，主流文学创作也是寂寞



清冷的事业，但至少在获得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奖项之后会迅速走红，作者能吃上“商品粮”。而科幻作家是无法跻身主流文学奖项的，而银河奖在圈外默默无闻，这种状况在《三体》走红之后才有所改变。很长时间内，刘慈欣写科幻在单位里是保密的，有人问起“写科幻的刘慈欣”，他就搪塞那是同名之人。我在工厂里因为在技术上资历老，是专业带头人，受到的待遇相对宽容得多。那时写科幻是养活不了自己的，所以作者大多为业余。当时只有两个专职科幻作家，北京的星河因为是体制内的合同制作家，又得北京的地利，经济状况相对好一些；另一个专职作家郑军则很苦，写作累得颜面抽搐，但写了好多部长篇无法出版，生活难以为继，我和刘慈欣都曾资助过他，但我们能拿出的资助也是微乎其微。可以说，90年代的科幻作家能坚持到今，全靠兴趣和爱好，靠着

一腔热血，靠着自身“甘于寂寞”的生性。

在科幻同仁的坚持下，中国科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复苏，直到今天的初步繁荣。这个时期的中国科幻现在一般称为“新生代科幻”。新生代科幻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有很大的不同，它完全“野生野长”，因而更早适应了商业时代，比其他文学有更强的生命力，登载科幻文学杂志的销量在中国原创文学杂志中名列前茅。而且，回顾往日，我们可以自豪的是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我们没有沉沦，没有媚俗，没有去赚那些“很容易赚”的钱，而甘守寂寞，坚守着文学的正道，坚持着仰望星空，讴歌真善美，弘扬时代和民族的主旋律，展现一个泱泱大国和民族复兴时代的沉雄心态。

中国科幻也经常写末世灾难，但决不是海盜海淫宣扬颓废，而恰恰是在宣扬昂扬奋争，只不过救世

者不再是美国电影中常见的“白人男子救世主”，而换成了地道的、更多秉持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中国式英雄。

从总体上说，科幻文学是俗文学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它的首要功能是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愉悦感。但科幻又比较特殊的俗文学，由于它是以科学为源头之一，而科学是一个博大深邃的体系，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望远镜和显微镜，所以科学常常赋予科幻作者以俯瞰历史、跨越时代的、甚至超越物种的眼光。所以这种俗文学天然具有很浓的雅文化的特质。

“野生野长”的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，因为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一般为本科以上学历，不乏名校硕博和一线科学工作者，从作家群体的平均学历水平上看，无疑是各类型作家中最高的。但他们又大多不安本分、思想狂放、玄天虚地、自我放逐，属于精英阶层的边缘人（科幻理论家吴岩语）。其实我觉得，对他们更合适的称呼是“草根精英”，这些草根精英们大多具有比较广博的、比较超前的视野，又因其草根地位具有比较超脱的观察角度和思想自由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价值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与迅猛发展的科技时代有更深的契合度。可以说，“草根精英意识”是新生代科幻作家的群体意识。上述这两个特点：俗文化中的雅文化，草根中的精英，只有理解这两个特点，才算是掌握了新生代科幻作品的源代码。

中国科幻目前已达到初步的繁荣，由于科幻作品所具有的影视改编的潜力，大量资金进入科幻圈儿，一方面，提高了作者的收入，让这个文学品种能够良性运转；另一方面，无可讳言它也带来了一些铜臭味儿。世事皆是如此，不能两全，没人愿意科幻作家们回到过去的贫穷和默默无闻。在商品社会，我们不得不遵循商品社会的规则，只希望金钱更多地成为助燃天才之火的燃料，而不会改变科幻作家们的“草根精英意识”，则中国科幻幸甚。

文艺评论

我家小狗很有灵性，每当我我表扬它的时候，它就使劲摇尾巴表示愉悦；如果我批评它，它的小尾巴就耷拉下来，郁闷大半天。由此可见，喜爱赞美是动物的本性，其实人也如此。但儿童心理学家告诫父母，对孩子的赞扬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，否则将失去赞美的意义。

对这个意见，成年人也有体会。假如领导表扬我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，我当然自豪；假如他表扬我不迟到、不骂人，我会哭笑不得，甚至以为是被批评。今年至少有两个人比我更哭笑不得。

小田同学是同济大学的博士生，父母是环卫工人，他利用暑假帮父母上街扫马路。对此，不少网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纷纷赞美田博士行为高尚，简直应该当选全国道德楷模或者学雷锋标兵。小田受到赞美反而很委屈：儿子替爸妈干点活儿怎么了？

与田博士相比，中国工程院的刘先林院士更感到痛苦和“烦恼”。因为在火车上坚持工作，特别是坐的是二等座，穿着旧鞋子、旧衣服，他突然成为“网红”加“扫地僧”。刘院士受不了这种恭维，说工作是他的习惯，并且自己的衣服鞋子也不破旧呀！他不得不严肃宣布：此事到此为止，太耽误时间了！

人们的赞扬肯定不是出于恶意，但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呢？

孩子孝顺父母本是天经地义，父母要是摊上这样的子女，睡着都笑醒了，可为什么小田就不该孝顺，孝顺就了不起？因为小田虽然是儿子，但不是一般的儿子，而是一名博士生。假如小田是一名快递小哥或农民，那就很正常。刘院士年近八十还从事业务奔波，确实值得敬佩，但人们都知道这是我国科学家群体的常态，所以不会惊讶。人们震惊的是他简朴的穿着和乘坐的席位，如果刘院士在众人簇拥下，西装革履地端坐在商务座里喝茶，可能未必出名，至少不会“爆红”。

中国封建社会终结只有一百多年，封建等级制观念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中。那么多人强加给田博士一顶高帽子，源自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旧思想。而刘院士身为数量有限的院士一员，又是中国测绘科学院的名誉院长，按照“官本位”的陈腐理念，他应该享受高级别席位，应该冠盖华服气势逼人，应该颐指气使地让别人去

『惨遭』表扬

□ 单纯

干活儿，这才符合他尊贵的身份。一旦应该扫天下的博士生扫大街，就是奇闻；一旦应该耍威风享福的院士不要威风不享福，就成为另类。

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并不少见，主动被动的廉价表扬时常可见。有一次在机关食堂，我听到有人跟领导打招呼：领导亲自吃饭啊？领导苦笑说：你替我吃？有人曾调侃，电梯里假如都是单位领导，电梯不会动，因为没人“亲自”按按钮。因此新闻报道表扬领导“亲自”下基层，“亲自”参加会议，“亲自过问”什么事，大家似乎不感到不妥。我也听到有的社会精英这样自夸：我这人待人最平等，我跟司机都很谈得来，对门卫也很尊重。那意思是说，我比他们社会地位高，尊重他们是难能可贵的美德。

言为心声，问题表现在语言上，实际上来自于深层次的思想意识。对于这些东西，有学者称之为“腐败亚文化”，这是有道理的。腐朽的封建思想意识在社会上弥漫，容易恶化社会风气，阻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——可以想象，一旦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了官，会是何等做派。“腐败亚文化”一旦弥漫在党内，则直接腐蚀政治生态，影响社会风气，为腐败行为制造温床适宜的环境。这是前些年社会风气和党风出现问题的深层次根源——社会文化根源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，“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，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”。

链接

谈中国科幻，你不能不知道王晋康

科幻有“双王”：大刘和老王。大刘就是现在人尽皆知的刘慈欣，老王王晋康却不为圈外人熟悉。王晋康祖籍河南南阳，曾任高级工程师。业余创作科幻小说，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60多篇，长篇小说16篇（含小长篇），总计300余万字。从处女作《亚当回归》到《转生的巨人》，王晋康一共拿下18座银河奖奖杯，这一记录前无古人，估计以后也难以被打破。他不赞同“科幻小说专为工程师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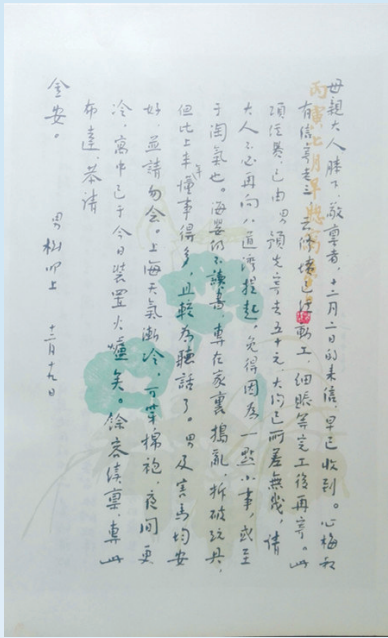
作”的观点，他的作品雅俗共赏，风格苍凉沉郁、冷峻峭拔，在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哲理思考中，融合了大量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，尤其是生物学发现。

作为一位工程师，他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仅出于爱好，有点票友心态。在开始科幻写作时，只是为了写“个人之所欲言”，他心中没有科幻与主流文学的藩篱之见，没有“科幻必须如何写”的定规，也没有经过对外科幻作品的

模仿阶段。再加上写作科幻时已经45岁了，与其他年轻作者相差至少一代。他是站在过去看未来，所以笔尖下流淌的自然是对这个时代、这个民族的感情。

王晋康认为，科幻文学曾被寄予普及科学、传播知识的重任。如今的科幻文学，更应根植于中国土壤，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面向大众。科幻不仅仅是简单地描绘有关未来的发明创造，而应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拥抱未来。

鲁迅家书的别样情怀



□ 杨建民

阅读鲁迅，是在一个非常时期。小学最后两年，初中，高中，后来下乡插队，都在“文革”中度过。那个时段，汲取精神营养的“口”大张着，焦渴着，怎么也填不满。可惜，能够读到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品，几乎就是一片鲁迅著述。在“文革”中，鲁迅是按一个形象塑造的——斗士。选本中，大都是他与人论辩的杂文。尽管嬉笑怒骂、犀利彻骨的语调，很符合青年时期的心态，可却从此留下一个满脸愤恨，张口尖锐的极端形象。经过许久，等到能够

阅读更多鲁迅的文字，他的面貌，才渐渐显出全面，变得有些自然，甚至亲切起来（这正是他的主张：读一个人作品，最好是全集）。这般形象的建立，除去得自如《祝福》《故乡》等小说那深切的人间悲悯，更多，却来自通信——家书。

从锐意尖刻的杂文，一下子跳到他的家书，你脸上会不由得浮上笑意。那种不常见的波俏调侃，淡淡的亲昵（称许广平“乖姑”），以及谦和谨敬，亲切恭顺的笔调（对母亲），使你见到另一个大相径庭的形象，有一种发现人性丰富的快感。

恋爱属非常时期，举例有时不足为凭，故笔者常常在鲁迅致奉母亲的家书中，阅读到一个“斗士”的亲情表达。前数年购得一九七九年版《鲁迅手稿全集》书信卷数册，见到许多文字外的信息。此行文时一并陈述。从现存的信画看，鲁迅给母亲的信，大都写于他去往上海定居之后（此前许多时间，他基本与母亲一起生活）。现存第一封信，写在底子印有松竹的笺纸上。用的是相当旧式的敬格：“母亲”二字高出，后面内容，全部压低一行。结尾处“恭请金安”四字，均分两行。无论“恭请”二字写到哪里，“金安”二字必另提行，高于全文，与“母亲”二字等高，以示诚挚。再往后的“男树叩上”句，“男”略小于其他字，摆在偏右一点的位置，表示晚辈地位（所有给母亲信函，凡是写到自己处，均称“男”，且小于他字，皆靠右位置。因信函为竖

行）。这些透过格式显现出来的东西，在一般印本中还真难于体味。

格式之外，字体也十分清楚。笔画洁净，安置妥帖，通篇看去真是舒爽。这一点，与前后给他人的信画比较，极为显著（友人之间，多是学人，是略可自在疏散些的。母亲识字不多，加之是长者，不能不认真对待）。陈述的言辞，也是恭敬，至诚但亲和的。譬如信首，完全是文言敬辞：“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。”行笔时，颇照顾母亲心思。譬如写到孩子海婴，便很是细致：“海婴疹子见点之前一天，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风，但次日却发得很好，移至宾馆，又值下雪而大冷，亦并无妨碍，至十八夜，热已退净，遂一同回寓。现在胃口很好，人亦活泼，而更加顽皮，因无别个孩子同玩，所以只在大人处吵嚷，令男不能安静。所说之话亦更多，大抵为绍兴话，且喜吃咸，如霉豆腐，盐菜之类，现已大抵吃饭及粥，牛乳只吃两回矣。”这样看去有些絮叨，琐细的内容，大不似鲁迅文章的精炼用笔，可收信人是千里之外的母亲，是关心着自己孙子的奶奶，所以，鲁迅尽量写得细致，甚至似乎琐碎。他知道，母亲最希望了解孙子细节，越多越好。符合收信者心理，才是一封信画最应切中的地方。

鲁迅有名气，也常常被人传播谣言。一九三四年三月，鲁迅得到朋友函件，知道天津的《大公报》上，刊有一则似乎从海外传来鲁迅得严重脑膜炎的消息。除去给朋友人回复，他更怕母亲担

心，赶紧去信辟谣：“母亲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久未得来示为念。近闻天津，有登男生脑炎症者，全系谣言，请勿念为要。”不管母亲是否知道，首先考虑到老人的承受力，消除隐患在前。这些举止，后辈们真该多学学着点。

母亲在北平，鲁迅在上海。不能时时给老人慰藉，鲁迅便想给母亲寄一点她可以读的通俗作品消遣。一九三四年五月，他买了当时最有名的通俗作家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等作品寄给母亲：“又，三日前曾买《金粉世家》一部十二本，又《美人恩》一部三本，皆张恨水所作，分两包，由世界书局寄上，想已到，但男自己未曾看过，不知内容如何也。”张恨水的作品，当时在市民阶层有极大影响，虽然在鲁迅眼里，这些作品他本人是不在意的，故此有“男自己未曾看过，不知内容如何也”的补充。可是，只要母亲高兴，在文学兴趣上，鲁迅是可以让步的，这应该他他为母亲购买寄上的重要原因。

过了几个月，母亲大约读毕了张恨水作品，写信来告诉鲁迅，请再寄一点。鲁迅马上回复：“十五日来信，前日收到。张恨水们的小说，已托人去买去了，大约不出一礼拜，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。”过了几天，鲁迅又给母亲去信，说到这些作品：“小说已于前日买好，即托书店寄出，计程瞻庐作的二种，张恨水的三种，想现在当已早到了。”程瞻庐也是当时的一个通俗小说作家，著有《茶寮小史》《快活神仙传》等。这些当然是为母亲专门

挑选的。母亲虽然喜欢读这些作品，可一看定价，觉得太贵，花多儿子钱了，便写信过来。鲁迅便回复给母亲解释：“张恨水的小说，定价虽贵，但托熟人去买，可打对折，其实是不贵的。即如此次所寄五种，一看好像要二十元，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。”

当然，一些有关自己的重要信息，鲁迅也得告诉母亲。到了一九三六年，他的身体显然出了问题。对于最亲密的家人，这是不能不禀告的：“男自五月十六日起，突然发热，加以气喘，从此日见沉重，至月底，颇近危险，幸一二日后，即见转机，而发热终不退。到七月初，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，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，至少曾发病两次，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，现肋膜变厚，至于不通电光，但当时竟不医治，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，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。……所以病已向愈，万请勿念为要。”对于惦念的家人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不尽量说清的，虽然结语处有所安慰。鲁迅学医出身，他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，但却不简单采取隐瞒态度，使得家人（即使年高的母亲）受到可能到来的事实的打击。

这些家书，对于全面认识鲁迅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“文革”之前、之中及后来很长时间，无论研读、描述、绘画，鲁迅都是按照某种特定的“斗士”形象塑造的。这给人留下了“不近人情”的印象。通过阅读这批家书（尤其看到影印手迹），他的形象才清晰，全面甚至可爱起来。